秋　夜

巴　金

窗外“荷荷”地下着雨，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，风从窗缝吹进来，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。我刚翻到《野草》的最后一页。我抬起头，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。

仍旧是矮小的身材，黑色的长袍，浓浓的眉毛，厚厚的上唇须，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，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。他深深地吸一口烟，向空中喷着烟雾。

他在房里踱着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他抽烟，他看书，他讲话，他俯在他那张书桌上写字，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，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……

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平易近人。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。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。

不管窗外天空漆黑，只要他抬起眼睛，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，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，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可能。不管院子里暴雨下个不停，只要他一开口，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。他从不教训人，他鼓励你，安慰你，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，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，倘使有绊脚石，他会替你踢开。

他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他还是那么安静，那么恳切，那么热心，那么慈祥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好像从他身上散出来一股一股的热气。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温暖了。

风在震摇窗户，雨在狂流，屋子里灯光黯淡。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目的光。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。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。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，成了一个鲜红的、透明的、光芒四射的东西。我望着这颗心，我浑身的血都烧起来，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，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望。这不是第一回了。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，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，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，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。其实不仅是我，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，受到鼓舞，找到勇气，得到启发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燃烧，跟着他到了窗前。我记起了，多少年来这颗心就一直在燃烧，一直在给人们指路。他走到哪里，他的心就在那里发光，生热。我知道多少年轻人带着创伤向他要求帮助，他细心地治好他们的伤，让他们恢复了精力和勇气，继续走向光明的前途。

“不要离开我们！”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，这是许多人的声音，尤其是许多年轻人的声音。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我决不离开你们！”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。我看见他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窗前,向窗外挥一下手,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过多少次的话。

雨住了,风也消逝了。天空不知在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。夜很静。连他那颗心‘必必剥剥’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。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,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,我听见他激动地、带感情地说:

“忘记我,管自己生活。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。

“难道为了你们,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?

“难道为了你们,我还有过什么顾虑?

“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退却,在暴力面前低头?

“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,敢做,敢骂,敢恨,敢爱?

“我所预言的‘将来的光明’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?

“那么仍然要记住:为了真理,要敢爱,敢恨,敢说,敢做,敢追求!

“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!”

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。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。从四面八方送过来响应的声音。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,愈凝愈厚,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。不知道从哪里送来了火,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,愈燃愈亮,于是整个房间,整个夜都亮起来了,就像在白天一样。

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,愈燃愈小,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。它愈燃愈往上升,渐渐地升到了空中,就挂在天空,像一轮初升的红日。

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形,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。

我连忙跑到窗前。我看出来:像初日那样挂在天空里的就是先生的燃烧的心。我第一眼只看到一颗心。可是我仰起头仔细再看,先生的慈祥的脸不是就在那儿:他笑得多么快乐,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!

我笑了,我也衷心愉快地笑了。

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,而且也永不会死!

我回到写字桌前,把《野草》阖上,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明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。……

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《野草》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。

窗外还有雨声,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,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。

可是在先生的书上,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的心。

1950 年 9 月

(载 1956 年 10 月号)

花　　迎

徐懋庸

可惜没有时间回到故乡去调查、考证一番，只凭少年时候留下的一些永远是生动的印象，我对于故乡的花迎，每次想起总感到极大的兴趣，而且以为很有意思。

“花迎”这个词儿，很美，很别致，我不知道出于何典，其实是一种迎神赛会，迎的神是东岳庙的三位“菩萨”。时间总在农历二月初，惊蛰以后，春分以前，因此，我猜想“花迎”的意思，实际上是欢迎百花齐放罢，但也许是“花朝迎神”的简称。

那时候，我乡的迎神，每年有三次。六月间迎一次华佗菩萨，十月间迎一次“青山庙”的土地老爷，也演戏、游行，但都不如花迎的郑重和热闹。花迎的时候，要从绍兴请最好的班子来演三天乱弹戏。三位“菩萨”高坐在戏台和广场对面的、灯烛辉煌的大厅里的供桌上，享受着极丰盛的斋供，一面看戏，一面还听旁边的“十番”。那“十番”就是“票友”的清唱，生、旦、净、丑俱全，也有“场面”；一晚唱一本大戏，如“龙凤锁”之类。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保长，平时催粮催款，很讨人厌，但在唱“十番”的时候，却受人欢迎了。他闭着眼睛，直起脖子，从牙齿不全的口里唱出“金凤姑娘”的爱情歌曲来，十分迷人。他又“熟统纲”，就是熟悉全部戏文和锣鼓点，所以又是教师，是一个非凡的人材。平时受他逼迫的农民们，这时跟他在一起合唱，忘记他是保长了。“十番”唱得真好，内行的人，宁可站在供桌边听“十番”，而不去看对面的戏。

但所谓“花迎”，指的实是迎神游行。我乡有东西两条溪流，象两只胳臂，拥抱住村子。花迎的第二天，迎神的队伍，在东溪两岸环行一周，第三天又在西溪两岸环行一周；人们叫做“东河两岸”和“西河两岸”，把“溪”说成“河”，自然是夸大，但据说，这是借用县城里的说法的，县城里也有花迎，那真是环“河”的游行。在“东河两岸”和“西河两岸”的日子里，男女老幼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至少是干干净净地，坐在或站在溪中的沙滩里和岸边的大路旁，参观花迎的队伍。

队伍来了，最先是“报马”（在我们那里，别的时候是看不到马的），接着是“嗐……嗐……嗐……”的鸣锣喝道；“肃静回避”牌和全副仪仗，以后是各种艺术表演过来了。

艺术表演的节目是很丰富的，我所记得的，有以下几类：

一是“抬阁”，由八个人抬着，一座木台子，上面站着扮故事的人们。有的“抬阁”上站的是《白蛇传》中的白娘娘、许仙、小青和法海和尚，有的是桃园结义刘、关、张，有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……都是十几岁的富家儿童扮的，化装得很漂亮。有的“抬阁”，还竖起一根三、四丈

高的铁柱,在顶端把小青或张飞的身子绑住。应该是不舒服的罢,但他们似乎很得意于自己的出风头。这些‘抬阁’上的人物,都是静止的塑像。唯有一个‘抬阁’,是有表演的,那上面坐着一个糊涂官,审问着由两个皂隶锁着走的一对男女的风化案。官穿着清朝的公服,嘴里打着官话:“混账王八蛋……什么……什么……”(我们家乡的土话,是不叫‘什么’的)……说完几句就拿起一个尿壶喝一口‘酒’,看到这样一个官,观众乐极了,无不哈哈大笑,叫他“尿壶官”。于是官重重地拍几下‘惊堂木’,对观众大喝:“不许笑……我老爷要打你们的屁股……”又端起尿壶喝。自然,观众是笑得更欢了,这是最受人欢迎的一个节目。

其次是音乐‘亭’,分做‘大敲亭子’和‘细敲亭子’两种。“细敲”是管弦乐队;“大敲”是打击乐队,各有好几队,每队总有十来个人。所谓‘亭子’,是用两个人抬的扎彩的架子,放着皮鼓之类的乐器,一个人钻在里面,走着敲,其他的队员们,则围绕着‘亭子’演奏。“细敲”自然是悠扬的,但插在这样热闹的队伍中,而且时奏时停,就并不引人注意。“大敲”则很突出,一路‘锵令锵,锵令锵……’地敲过来;在观众较密的地方,“大敲亭子”就站住,有一对‘招军’(即鲁迅所说的‘目连嗐头’),‘达达帝,达达帝……’地配合着,演奏出一种令人兴奋的音乐。有的‘大敲亭子’,则作为狮子舞和高跷舞的伴奏。“招军”在这里,对于增强效果起了很大的作用,特别在结尾的时候,那高音的‘帝……’长达十几秒钟,突然煞住,舞蹈停止了,锣鼓转为普通的‘锵令锵’的行进调子,催着队伍渐渐远去了,使观众有一种余味无穷的感觉。高跷扮的通常是‘八仙’,也有扮‘大头和尚’的,是一班戴着很大的假面具的——罗汉罢?

还有是各种杂技:舞锐叉,玩‘菜瓶’(磁坛子),掼碗;……技艺都是很高明的。

鲁迅在《五猖会》里所说的‘扮犯人’,我们的花迎里也有的。“活无常”带着老婆、儿子,也参加。不过同他们在一起的,还有一个‘掇米筛’的。“掇米筛”本来是我乡送鬼的一种办法。平常是,由一个人,用米筛端着几碗菜、饭,在晚间送到一个偏僻的角落,请鬼吃一顿,打发它不再来缠人。实际上,这些饭、菜,是由‘掇米筛’的享受的,但路人碰上,也可以分享,叫做‘吃米筛羹饭’,吃了这好象也有什么好处。在花迎中,则在一个米筛上,钉住假的几碗菜、饭,端的人以各种姿式摆弄着米筛。“无常少爷”很贪嘴,抢着要吃米筛羹饭,无常大概是顾到廉洁,禁止他去吃,要打他。无常嫂嫂则卫护着儿子,那掇米筛的人,又引诱,又不让吃到,由这做出许多身段来。“招军”一吹,掇米筛的把米筛往地上一放,他们都在米筛周围舞蹈起来了。这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。

最后,三位‘菩萨’就要到来了,又是鸣锣喝道:“肃静,回避”;一班人挑着香烟氤氲的香炉,还有一架大‘香亭’接着是一队校尉,穿着号衣,有的‘呜……呜……’地吹着号筒,但每到这时候,观众就纷纷散去,等到‘菩萨’经过的时候,两旁留下的人已经不多,而且只有一些虔诚的老妇,才对着‘菩萨’膜拜。

据说,三位‘菩萨’里面,白脸的最大(该是黄飞虎罢),红脸次之,黑脸最小。照理,黑脸应该是在最前面的,但在我们那里,倒是红脸在前,黑脸居中,其原因,是黑脸最灵,也最凶,人们冲着他,他常要撒野“闯祸”,所以由红脸在前拦着他。

“东河两岸’和‘西河两岸’,环行一周,都有三、四里路。花迎的队伍,首尾相衔,还要拖出一大段到街上去。由此可知,参加花迎的人数是很多的,大概有一千左右罢,他们大部分

是农民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不禁首先惊异于人材之多,其中总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技艺表演的。行头也真齐全,不但扮演故事的人都有相应的服装,而且各种乐器、道具,也都加上彩饰。这些行头、道具和“亭”、“阁”之类,都是族内各房宗祠置备的。但某些乐器和富家儿童扮“抬阁”的服装,也有自置的,花迎的组织工作者也很有经验,各种节目排列的次序,都很恰当。队伍的集结,行动和解散,也很有秩序。

参加花迎队伍的人,叫做“老佛”,他们在出发以前,结束以后,都到各家去吃斋。两天就吃四顿斋。斋是预先由管事的到各家“写”定的,一般中农之家,志愿地办一桌,富裕的则两桌、几桌不等。四顿斋,共需五、六百桌。这里也有周密的组织工作。“老佛”们由每次管事发一纸条,指定八人一桌,分派到某家、某家去吃。办斋的人家“斋老佛”很虔敬,因为他们是神的队伍。斋都是素菜,六碗,外加“油鸡”、“雪枣”等甜点。吃的人都很高兴。

关于花迎的来源和与它有关的许多内容,因为暂时无法调查、考证,所以它的社会意义,我也不明白。从我们家乡的情况来看,似乎与宗族制度有关。这是由族中的“长上”领导的。在宗族内的统治阶级,也许是借此“与民同乐”一下,以掩盖宗族内部的贫富对立,缓和阶级矛盾的;或者还有提高农民情绪,推动春耕的用意在内。但这是揣测之辞。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:花迎对于农民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节日。他们得到娱乐,“老佛”们还可以饱饱地吃四顿斋,而且有了在广大群众前面显示自己的本领的机会。的确,富家的儿女们,穿着漂亮的服装,扮着“报马”和“抬阁”,虽然也出风头,但真正受到群众欢迎的,却是农民的表演。出出官的洋相,也给了广大群众一种很大的快感。至于敬神的意思,我看是很少的。

花迎一过,农民就要紧张地参加生产劳动了,自然,他们大部分是为地主而劳动的,生活的苦恼又来了。但是,花迎所给予的热闹和欢乐,总要在他们心里留上十天半个月。

(载 1957 年 4 月号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走上狭窄的楼梯

——在列宁格勒涅克拉索夫故居

靳　以

从照满阳光的大街上,我们踅进阴暗的屋子,走过潮湿的穿堂,我们的脚踏上了狭窄的楼梯。我想着就在这楼梯上,将近百年前车尔尼雪夫斯基,杜勃罗留波夫,萨尔蒂可夫·谢德林,屠格涅夫,托尔斯泰……曾在这里走上走下,留下了他们的脚印;可是现在擦着我的身子走下来的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,他们明亮的眼睛发着光,他们清脆的语音象早晨的鸟鸣,散发着他们幸福而快乐的心情。两个不同的世纪,两个不同的时代,诗人涅克拉索夫所攻击、所诅咒的时代早已无影无踪了。他曾悲愤填膺写过"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?"今天的诗人,将毫不迟疑地写出"广大的苏联人民是快乐而自由"的诗章。

走上狭窄的楼梯,明朗的阳光就从我的头顶上照下来,闪出了一片灿烂的天地。穿着猎装和高统靴的涅克拉索夫高坐在那里,右手放在膝头上,左手拢着猎犬的头,那只猎犬也亲昵地把下颚偎在他的手掌中,一支双管猎枪就竖立在他的两腿间。他的眼睛平视着远方,在他的眉宇间留有他的思虑和忧愁。这是雕塑家柯立沃茹兹基一九五〇年的作品,把战斗的诗人的形象和精神生动地显示出来了。

难道涅克拉索夫是那么一个闲情逸致的诗人,象那些靠人民血汗养活的地主贵族老爷一样,终日以狩猎自娱么?不,甚至他都不是一个"爱好幽静的竖琴"的诗人,他要的是严峻的歌曲,他喜爱的是"惩罚的竖琴",他以他的诗召唤人们向统治者复仇。他认为能暴露黑暗的才是有才华的诗人,他明显地说出来"没有为科学的科学,也没有为艺术的艺术——它们的存在全是为了社会,为了改进与提高人,为了增进人的知识和物质的生活福利。"他也唱出来:

> 谁要是在受着苦难的兄弟的病床前,
> 不流眼泪;谁要是心里没有一点同情,
> 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,
> 这种人,就不是诗人!

在那暴风雨的时代,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,他倾向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号召"拿起斧头来"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"复仇和悲哀"的诗人。他描写地主、官吏和高利贷者的丑恶的形象,也描写了人民的穷困,把拥有无限财富的地主和穷苦饥饿的

农民放进他的诗篇。他时常去打猎,就是为了深入民间和农民们谈心,深刻地了解他们的痛苦与忧愁,他们埋在心底的愿望。正如他自己的诗句“:我的使命就是歌唱你的痛苦,忍耐得使人吃惊的人民呵!”他用他的诗,向广大穷苦的人民吹起复仇的号角,他正是一个“枷锁的不可调和的敌人,人民的忠诚的朋友”。他大声号召:

为了祖国的荣誉,为了信仰
为了爱……去赴汤蹈火吧,
一无怨尤地去牺牲吧,
你不会白死的,
为事业而流了血,
这样的事业是巩固的。

从一八五七年涅克拉索夫搬进这所房子,一直到他呼吸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,二十年来这不仅是他的家,也是《现代人》和《祖国纪事》的编辑部,也是和他抱着同样理想的人聚会的场所。在沙皇的残酷的压迫和检查下,他们的刊物的每次出版都象是一次战斗的胜利。因此每当刊物出版的日子,朋友们便欢聚畅饮,庆祝新的胜利并准备下一次的战斗。他那间宽敞的客厅,就是他们工作、欢饮和战斗的地方。所以它的历史,正是当时整个时代文学状况的历史,也是俄罗斯杂志的历史。

在临街的大窗口,当年涅克拉索夫时常俯视着对面官衙受罪的贫民,使他怒不可遏,复仇的火焰在他的胸中更猛烈地燃烧着。可是当我从窗口望出去,官衙早已没有了,压迫人民的人也早已灭亡了,街上走着的是快乐的熙攘的人群。

《现代人》原来是普希金在一八三六年创办的,一八四七年才由涅克拉索夫主持,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给这个杂志注进了新的血液,使它成为向统治者斗争有力的工具。这个刊物不但遭受了敌人的压迫,而且忍受了内部的分裂——那就是一部分温情的,只主张渐进与改革的作家如屠格涅夫,冈察洛夫……脱离了这个杂志。但这样更显示出它鲜明的特色,它团结了一批新的有才能的平民知识分子,共同向敌人射击,引起人民对压迫者强烈的憎恨,号召人民去斗争和革命。

对于这样一个刊物,统治者的评语是“:反对政府,偏激的政治观点与道德观点,社会民主主义倾向,以及对宗教的否定态度及唯物论。”这是敌人的眼中钉,迟早总要拔去的,在一八六六年的六月一日,它被永远查封了。但一八六八年,他又主编了《祖国纪事》,开辟了新战场,向统治者继续射击。

在编辑部的一角,我看到涅克拉索夫生前用的不大的书桌,对于自己的诗作要求很严格的他,就是在它的上边为五行诗而终夜不眠。还有一张书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的,在他被捕以前,他常站在它的前面书写。

在他的卧室里,我看到他简朴的卧床,在长垂的床帏后边,现在悬了一幅他卧病在床的油画。看起来那时他很消瘦,不仅因为自己的疾病,更因为他为穷苦的人民心怀忡忧。俄国农

民曾送给他一只有链子的银牌,刻着‘农民的保护者’的字样,对他是适当的称颂。在他的遗物橱中,我还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缕头发,必是在他被捕以前送给他的,从这小小的遗物,也可以看出来他们间的深厚的友情。

就在他的卧室中,我看到墙下一座极其美丽的壁炉,在一排浮雕的下边,左右站着两个美妙的女像,在她们的头上飞翔着可爱的小天使。我想象得出当冬日的夜晚,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与战斗,他面对着熊熊的火焰,美丽的女神带着永远的微笑望着他,两个小天使,好象要飞向他的怀抱里,使他得到无言的慰安。不远处我看到他的妻子基娜和他妹妹的画像,在生前她们正是不断地给他慰安的两个亲人,她们无微不至地关心他,让他把所有的力量投入战斗。在一八七六年,他曾向他的妻子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

斗争妨碍我成为一个诗人,
诗歌又阻挠我成为一个战士。
谁为世纪的伟大的目的服务,
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
为了兄弟——人民的斗争,
这样的人,才能得到永生。

在八十年前,他离开了人间,他既是一个诗人,也是一个战士;正因为他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斗争,人民到今天也没有忘记他,他的诗句和他的不屈的精神还留在人间,甚至于他的家和他工作战斗的地方,也都完善地保留下来。

在他死后的三十年,生前他沉痛揭述的‘你又贫穷,你又富庶;你又强大,你又软弱;亲爱的母亲俄罗斯’已经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,建立了苏维埃政权,从此实现了诗人的幻想,成为了强大的,自由的,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她还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,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坚强的堡垒。今天,正如他所歌唱的:

“人可以更为美好,更为广阔地,展开他自己的力量。”

(载 1957 年 12 月号)

感情的波浪

——纪念上海解放十周年

唐　弢

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环境里，常常激发起人们蕴藏在心头的不同的感情：欢畅，喜悦，疑惧，忧伤，愤怒。时间隔离了它们，却又并不成为绝对的约束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各种各样的感情会一齐迸发，而且往往表现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个人的身上。

我曾有过一段这样的短短的经历。

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，我的记忆已被牵引到十年以前，那是一九四九年初夏，工贼陆京士逮捕了一批人，传说第二批名单马上就要发表，人们为了关心我的安全，劝我把家属搬到我所工作的大厦的四楼，那里住着一个亲戚，将老小四口并入他的家庭，以便一有情况，可以只身出走。我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，即使是在妻子面前，也只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照顾，而且大厦的结实的建筑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，挡得住猛烈的炮火。事情安排得十分顺利，我以平静的心境等候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故。可是形势却迅速地变化了，大军渡江以后，不但解放了南京，而且正在沿着宁沪线急遽进军，从外圈上把这个东方大城市包围起来。在上海的反动分子一片慌乱，陆京士瞒过他的亲信，仓皇地逃往台湾，所谓一批一批的逮捕，终于成为对特务统治末日的一个最大的嘲笑。

我应该怎样来诉述自己的感情呢？这一时期里一直强自抑制着的平静的心境，此刻却激荡起来，喜悦从心底萌芽，多少年来唇敝舌烂、寤寐以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下一个时辰，屈辱的上海将在我的眼前站立起来，从血污里宣告自己的新生。一想到解放大军入城时的景象，我突然领悟到祖国语言的妙处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才真正懂得了“心花怒放”这句话的意义。我们经常碰头的四五个人，开了一个小会，准备旗帜，草拟标语，并且为此集合了一部分力量。想想吧，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宏伟的行列中，我们将看到文艺界自己的队伍；在一排排临空招展的红旗中，我们将看到文艺界自己的标帜；在锣鼓喧天、满城腾欢的浪潮中，我们将听到来自文艺界的声音。百余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在这一瞬间得到了解放，这是历史的伟大的时刻，对此，谁又拦阻得了自己的热情奔放的向往呢？

我期待着，而且兴奋着。

可是出于意外，五月二十三日晚上，就在我工作着和住着全家老小的大厦里，进驻了反动派的最后一支军队，于是形势又急转直下。这是一支用“美援”装备起来的所谓“青年军”；他们选择面临苏州河的这座结实的大厦，作为负隅顽抗的指挥部。沿河堆起了重重叠叠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沙包,大厦南向的窗槛上，架满机关枪和小钢炮,屋顶的大钟楼成了瞭望台。我的一家就住在瞭望台下的四层楼上,从这里可以看到苏州河,河上的桥梁,桥梁上的行人。现在却一片悄静,桥中央用沙包搭起一个临时堡垒,桥南安上坦克,周围是乱七八糟的障碍物——从人家办公室里搬出来的家具:书柜、写字台、椅子和门板。我们现在已经被封锁、被隔绝了。和我一起的还有一百几十个当天正在值班的职工,大家商量着怎样保护自己的机关,渡过黎明前的这一段最黑暗的时间。令人焦虑的是:我们要使大厦免于劫灰,可是事实已经迫着它成为"烽火台",枪声一响,这里是唯一的要被攻打的目标;而且不幸的是:它所承受的并不是敌人的仇恨,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部队的炮弹。这是多么难堪的处境呵!

怎么办呢?

我们的决定是:住下来,静待时间。

二十五日早晨,枪声果然响了,这是从大厦里射击出去的。那些穿黄呢制服的人就忙乱起来,他们大都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,长得结实、壮硕,但此刻却头发蓬松,声音嘶哑,眼球里挂满血丝，看人时射出一股仿佛对一切都表示怀疑的凶焰，我应该怎样说呢:摸遍我全部的记忆,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可怕的眼睛,除非是在疯人或者野兽的瞳眶里,才能找到它们。我觉得这里预伏着杀机,意味着大厦里的敌对关系已经趋于十分紧张的程度。

然而坏事之难于逆料,也正和好事一样。一个新的机运又产生了。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到达,终于阻止了事态的发展。我们的先头部队进据了香港路,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;另一部分从河南路包抄到武进路,把这股残匪压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。现在他们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命运:关起门来屠杀呢?放下武器投降呢?虚张声势顽抗呢?第一条对他们不利,第二条还没有考虑,看来他们采取的是第三条。所以到了下午,枪声和炮声一阵阵紧密起来,但是打出去的多,打回来的少——甚至只是一些偶然的、疏疏落落的步枪声。说实在话,当时我们的部队如果还一下手,任凭大厦怎样坚固,它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齑粉和灰烬。

晚上,我睡在四楼的甬道里。九时过后,窗外一阵闪亮,炮声接着又响了起来,而且比白天的更猛烈,这几乎是一种疯狂的轰击,我敢断定他们并没有目标,只是象摸黑的人,总想咳嗽几声,给自己壮壮胆一样,他们害怕的是解放军的夜袭,因而炮声愈响,也就愈能从里面听出懦怯的灵魂的颤动。我躺着,思索着,仿佛看到整个上海都是红光,只有这桥畔的一角还留下个黑点,而我们一百几十个人,连同我的全家老小在内,却被圈禁在这个黑点里,我感到焦躁,厌恶,并且为自己的不能有助于消灭这个黑点而感到恼怒。

数着炮声,这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。

第二天一早,炮声停止了,整个上午只有一点断续的枪声。我们又开了一个小会,决定改变方式,设法去接近这些疯狂了的人们。午后,我转到住处,从临河的窗缝向外窥伺,对岸大楼的外墙上,出现了蜂窠似的弹痕,苏州河宽荡荡地,所有的船只都已撤走,桥堍的坦克被打烂了,倒在一边。街上看不到一个生物,没有一件能动的东西,整个城市就象刚从泥土里发掘出来的古旁贝城一样。桥上,沙包堆成的堡垒还在那里,一件黑黝黝的东西在蠕动。我注目而视,一个钢盔,一个人头,一个肩膀…… 我正想定睛细看，从香港路那面飞来一颗子弹,立刻,这件东西,不,一个"青年军"应声跌出堡垒,倒在柏油筑成的桥面上。这是我所

看到的从我们部队里打来的唯一的一枪,但是,多么准确和有力的一枪呵!我不禁暗暗地称赞着。

大厦里的机枪鸣叫起来,桥对面,现在又一丝儿声音都没有了,这就是战争吗?是的,这才是真正的战争。

我坐下来,为昨晚的焦躁、厌恶和恼怒而深深惭愧,然而感情的考验并没有结束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机枪的声音停止了,一阵海潮似的奔腾的声浪把我惊醒,侧耳细听,呵,呵,它来自不远的所在,来自南京路,是欢呼,是歌唱,是发自人民心底的最美丽的乐曲。我又情不自禁地跳起身,想尽一切办法远眺,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度,却还是望不到我们自己的队伍,望不到我所期待的红旗,只有声浪越来越大,越来越近。是入城的仪式吗?是人民自动出来欢迎的行列吗?可是不管怎样,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声音,我仿佛听到了亲手拟定的口号和标语,一点不错,就是这个。多少年来希望的果实出现在眼前,它是那么近,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它,而且我也似乎的确已经摘到了。突然脚底发出一阵小钢炮的轰鸣,我又被拉回到现实的囹圄里。两天以来,如果说感情的波浪曾经一会儿把我冲击到这边,一会儿又把我冲击到那边,现在,它们却汇集起来,交织起来,欢畅,喜悦,疑惧,忧伤,愤怒,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射中我的心坎,我一再向自己叮咛:冷静些,需要再冷静些!

又是一夜的炮声。二十七日一早,发生了新的情况,几个"青年军"在嚎啕大哭,另外几个喃喃地骂着。根据被派和他们接近的人说,天明以前,指挥官忽然失踪了,一个副官模样的青年乱窜乱叫,到处寻找着——事后发现,指挥官换上便服,躲在河滨大厦一个外国人的家里——。我们期待着的时间已经到来,条件成熟了,决定由机关负责人出面,向那个副官劝降。副官提出三个要求:一、不能侮辱俘虏;二、准许退伍;三、资助回乡。最后,他绷紧脸孔,几乎近于威吓地说:

"如果不答应,我们死守到底,和你们同归于尽!"

"和我们?"我在心底里笑着:"我们还要活下去,鬼才和你同归于尽哩!"

撤销了电话的监视岗,我被派去设法接上关系。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对新社会的陌生,说实在话,河对面的情况,我一无所知。新的机构成立了吗?应该和谁取得联系?我决定打电话到《大公报》,找到了一个熟悉的记者,委托他把意思转达。下午,军代表打来回电,并且传达了解放军的纪律,证明所谓要求,其实不过是受蒙蔽的一种恐惧心理。整个大厦都哄动起来。我回到住处,找出两幅被单,几个人忙着把它缚在竹竿上,也不问那个副官同意不同意,一窝蜂扛到屋顶上,高高地挂了出去,这就是在黑点里树立起来的最后的降幡。

我的感情的波浪平息了。五月二十八日清晨,当大家抬起头来仰望时,大厦的最高处,代替昨天的白色的降幡,现在是一面鲜明的大红旗,它正在迎风招展。

(载 1959 年 5 月号)

艺海拾贝

秦 牧

眼睛的奥妙

画人像,眼睛是很重要的关键。其他轮廓具备,眼睛画得象了,那人物就灵活起来了。

因此,关于画眼睛,在画史上就流传着许多佳话,有些甚至衍变而成神话。

晋代的顾恺之,画过《女史箴图》、《洛神赋图》等名画,一向被人推为中国画史上的第一位画人物的宗师。据说,他画的人物,往往好几年不点眼睛。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,他说:"四体妍蚩,本无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(这个)中。"

南北朝时的画家张僧繇,擅于画龙,民间故事说他在金陵安乐寺的壁间画了四条龙,不点上眼睛的时候一切如常,一点上眼睛,龙便破壁飞去了。"画龙点睛"这句话,就由此产生。

现代的湘绣,也很讲究绣眼睛的技巧。据说,当年最著名的湘绣,绣眼睛成为"家传之秘"。人像的眼睛、动物的卷毛这些细活,总是放在内室,由湘绣名家的儿媳妇们自己做,不传外人。绣线也异常考究,一根丝线,要分成十六股;一种颜色,从最浅到最深,要分成十三种。用这种丝线和这种技艺绣出来的人物,栩栩如生,那眼睛竟象是会瞬动一样。

透过神话的迷雾,透过"玄妙"的气氛,我们看到了艺术上一项重要的真理:画龙必须点睛。不点上眼睛,龙始终活不起来。

一首曲有它的最美妙的地方,一出戏剧有它的高潮,一幅画有它的最精彩之处,一篇文学作品,也得有它的一处或几处格外闪耀光彩的地方。这些地方,都需要艺术创造者有"绣眼睛"的独到的本领。

譬如一座宝塔,一级级都筑好了,还得到那顶端去安上一个塔尖,这才成为真正完整的塔。没有塔身,塔尖是无所"附丽"的。但是有了塔身,缺乏了那个塔尖,也就不免失色。

譬如跳高的横竿,当它放在"低水平"的时候,是许多人都可以跳过去的,但是当横竿一格格往上提的时候,跳过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而当横竿放到十分高的位置的时候,能够纵身跃过的人,就创造崭新纪录了。艺术史上有好些人演剧演到昏倒在舞台上,写作写到死在写字台边(例如莫里哀与左拉),我猜想使他们致命的事情就是企图跳过最高的横竿。

大师们在"绣眼睛"时尚且如此吃力,可见"绣眼睛"决不是简单的事了。唯其如此,艺术创造者决不能满足于一般水平,决不能满足于跳过"中栏"就算,而必须千方百计去跳过高

栏,去获得‘绣眼睛’的卓越艺术。自然这不是一个单纯技巧上的问题,而是思想、生活知识与艺术素养的最高度的结合。

艺术家如果不把跳高的横竿一级级往上提,虽然长期从事艺术创作,也不一定能够获得这种卓越的技艺的。

画蛋·练功

中外美术史上有两件事情相映成趣。

中国唐代的吴道子有‘画圣’之称。十二岁开始学画,五十多年没有间断过艺术生活。他画的人物,前人形容它有‘八面玲珑的妙处’。传说他初学画时画过许多鸡蛋。因此以后画起圆圈来,信笔一挥,就象用圆规画成一样,‘令人看见惊栗’。

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成为‘画坛三杰’之一的达·芬奇,画过《蒙娜丽莎》、《最后的晚餐》和许许多多其他著名的画。据说他小时候学画也是从画鸡蛋、画苹果开始的。他的老师起初总是要他画这类东西。达·芬奇不耐烦的时候,老师就这样告诉他道:‘别以为画蛋很简单,很容易,要是这样想就错了,在一千只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形状是完全相同的。即使同是一只蛋,只要变换一个角度看它,形状便立即不同了。例如把头抬高一点,或者把眼睛看低一点,这个蛋的椭圆形轮廓也大有差异。所以,如果要在画纸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,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。多画蛋,那就是训练眼睛去观察形象,训练手随心所欲地表现事物,等到手眼一致,那么对任何形象都能应付自如了,这个基础工作必须首先做好。’

达·芬奇听从老师的话,一步步努力,终于成为卓越的画家。

中西画史上都有这么一桩轶事。这说明‘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’这道理,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

基础的功夫很重要,好象积木游戏,底下不端正,搭起来的东西就容易倾倒,就是不倾倒,也很容易歪歪斜斜。有些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,成为著名演员之后,仍然必须大练基本功,道理也正在这儿。

必须打好基础,才能够建造房子,这道理是很浅显的。但是好高骛远、贪抄捷径的心理,却常常妨碍人们去认识这最普通的道理。

不但在开始学习的时候,应该从最基本的事情入手,就是到了获得卓越技能之后,也仍然必须不断‘练功’,这道理比上面的道理,也许就要稍深一层了。

某些有经验的作家谈到他们锻炼写作的情况时常常说:‘我们每天都得写些东西,这样笔才不致于荒疏。每天一定要写两小时,没有材料写的时候,就写读书笔记,写书信,甚至描写窗外风景,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拿去发表。经常这么动笔,真正写作起来才可以挥洒自如。’我想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。虽然不一定要天天写,但是经常‘练功’是有必要的。比较成熟的艺术家如果不是经常‘练功’,欣赏的水平一天天高了,而表现的技术却没有相应提高,时长日久,就很容易形成‘眼高手低’。程度不严重的‘眼高手低’还不怎样碍事(也许眼力比手力高些是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状态),程度一严重了,就只好搁笔了。‘眼高手低’常常是

使许多原来的名手渐渐无声无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为了避免这种状况“练功”就很重要。齐白石、徐悲鸿都留下了许多类似速写素描的小画，数量之多颇为惊人。这就是他们经常“练功”的物证。梅兰芳、盖叫天这些表演艺术家，都是到了五六十、六七十之年还是经常吊嗓子、练身段、温习腰腿功夫的。这些人所以成为“永葆其美妙青春”的优秀艺术家，这应该说是原因之一。

不但戏剧家、画家要“练功”，作家也应该“练功”，“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”这俗谚正好说明了练功的重要。

看来是普普通通的练功，它已经超越过“画鸡蛋”的初级阶段，具有维持和发展练功者的艺术高水平的意义了。即使是世界的举重冠军、乒乓球冠军，也是非经常练习举重和打乒乓球不可的。

画蛋、练功这样的事情，应该支配艺术工作者整整的一生。

“一字师”

清代有一部著名的弹词叫做《再生缘》，讲的是孟丽君的故事。这故事许多爱听弹词唱本的妇女都异常熟悉。

和孟丽君的故事同样为好些人所熟知的，是“一字师”这个典故，它和《再生缘》的作者也曾经发生过关系。

这部讲妇女乔装赴考、中了状元的弹词，前后两位作者陈端生与梁德绳，都是女作家。

梁德绳续成《再生缘》的时候，在书里面写了一些类似跋言的唱词。里面有这样的话：“每到忙时常搁笔，得逢暇日便编词。”“如遇赏音能改削，竟当一字拜为师。”

“一字师”，在唐宋的诗坛中常常出现，往往一个人做的诗，被旁人改动了一个字，立刻喜极下拜，尊称对方为师。这样的“师”，就是所谓“一字师”。梁德绳在《再生缘》里的话，就是据此而发的。

古代文人们一般都很重视字的推敲。在清代，往往有一些文人由于把某一个词汇用得巧妙，竟因此获得一个雅号的。例如著《池北偶谈》的王士禛，因为和《漱玉词》，有“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”的句子，就给人号为“王桐花”。他的弟子崔华，诗作中有“黄叶声多酒不辞”的句子，就给人号为“崔黄叶”。还有一位姓管的诗人，诗作中有“两三点雨逢寒食，廿四番风到杏花”的句子，就给人叫做“管杏花”。

这些王桐花啦，崔黄叶啦，管杏花啦，仅仅是由于写了一两句被人认为奇警隽永的句子，就给加上了一个诨号。这样的事情，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奇特的，然而当时却习以为常。从这些事情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好的一面，是古代文人“一字不苟”的精神；不好的一面，是把文学的功夫大部分放在字斟句酌、词藻的追逐上面去了。

思想低下、生活气息贫乏的作品，无论词藻如何精美，我们今天是决不会给它任何好的评价的。那只是舍本逐末的、形式主义的东西罢了。

但要是那重要前提具备了，思想很好，生活气息浓厚，那么，在词汇的运用上，下不下功

夫,恰当精妙与否,便起着很大的作用。

同是一条新鲜的鱼,烹调得好坏,滋味可以相差很远。自然,根本没有鱼,无从谈什么烹调 但是有了鱼之后,烹调就是重要的问题了。

我们读文学作品的时候,常常有这样的感受:一大段文字使我们受到感染,而在那段文字中出现一两句极其精警的句子,用了栩栩传神的字眼的时候,给我们的感染才突然达到高峰。这情形很象是烧开水,九十八度,九十九度,水都没有沸,再加一度,水就突然沸腾起来了。这情形也很象某几种元素在化合,加一点触媒剂的时候,那个化合过程就飞速地完成了。

自然这不单纯是技巧问题,但是在一切重要条件具备之后,语言艺术是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的。

文学本来就是"语言的艺术",遣词造句的功夫是值得重视的。"一字师"之类的事情,我们自然无须照搬,但却很可以从中吸取教益。马耶可夫斯基也说过从一大堆"字矿"中去提炼精粹的纯粹金属一类意思的话,我想,那意义大有相通之处。

(载 1961 年 5 月号)

山川小记

碧　野

古　柏

在江边的山头上,突立着一棵古柏。这棵古柏映照过江流无数次的涨落,印证过山区人民的重重灾难,经历过千百年时势的变迁。

可是现在,这棵已经干枝秃梢的古柏,春来忽然暴发新枝,变得茂盛苍翠。

这棵古柏盘根在石缝中,生长在临江的"跌跤岗"上,它饱经风霜。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,它用树荫遮盖过出山进山到此歇脚的山民,招来山风和江风,吹散他们浑身的疲劳。人们喜欢在它的荫凉下吃一点蒲包里的冷饭,喝几口山泉,然后枕着柏根,摊开四肢,舒展筋骨。

但是从它遍体鳞伤的铁黑的树干上,可以看出它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,受过不尽的摧残和折磨。那斑斑剥剥的是马[illegible]印,那一道道裂纹的是刀斧痕。反动军队进山"剿匪",出山砍树,它和山区人民一同度过苦难的岁月。
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,江面上出现了钻探船,沿岸出现了水文站,山上出现了测量队。白天,谁把红旗挂在它的身上,象给它披红似的,风吹红旗,闪啦啦飘;夜里,谁把明灯挂在它的身上,象给它结彩似的,明灯照亮午夜,迎接黎明。它第一次担当起山区水利建设的重任,它用红旗、用明灯给人们指示方向和位置。

从这一天起,年轻的技术员喜欢围坐在它下面,一边揩汗一边唱歌;老工程师绕着树身,用手指轻轻地敲着它,用手掌心亲爱地抚摸它;前来巡视的领导同志,放心地背靠着它,面对江流沉思。

不久,上游、下游,深山、平原,从每一条崎岖的山径上,从每一条平坦的大路上,背锅、挑担、推车的一支支队伍,从四面八方闹闹嚷嚷地汇集到这古柏临江的一带山里来了;而且溯着干流、顺着支流,一队队闪光的帆船和一串串冒烟的轮船,运着建设器材,运着生活物资,浩浩荡荡地开到这古柏照影的江边来了。

沸腾的日子开始了。爆破顽石的炮声如雷,烟焰冲天,地震山摇,江水扬波。

古柏屹立山头,成了水利工地突出的标志。初来的年轻民工有的掉了队,就会自自然然地走到古柏下来过夜。古柏展开枝叶,给他们避雨,给他们遮霜,给他们安身,给他们温暖。

而带队的老队长,也会自自然然地跑到古柏下来找丢失的民工,欢欢喜喜地把他们领回去。

通往古柏的山径,过去是晴天崎岖、雨天泥泞,可是现在已经被修成一条坦荡的大道,“跌跤岗”已经变成了“登云路”。古柏下,挂起了电灯,设立了日夜茶水站,让路过的民工们在这里休息休息,解解渴,下盘棋,读读报刊,谈谈乡情。

现在,住在江这边山间的民工队伍,不论上班下班,都必须经过这棵屹立山头的古柏。清早、黄昏、黑夜,整齐的队伍举着红旗,敲着锣鼓,分批地来往在古柏下。古柏披满朝霞欢送他们,又吟着晚风迎接他们,吐着灯光欢送他们,又缀着露珠迎接他们。日日夜夜,朝朝暮暮,一月又一月,一年复一年,古柏象慈祥的祖父,一直抖擞着精神迎送这来往不绝的山区水利建设者。

不论白天和黑夜,不论清晨或黄昏,不论阴雨与天晴,只要站立在“登云路”的古柏下,从枝叶间,就可以望见拦江大坝凌霄的雄姿,就可以望见如龙的运石料的火车,就可以望见似舰艇横江的一艘艘采砂船,就可以望见横跨江上的铁索大桥,就可以望见一架架凌空擎臂的起重机,就可以望见象长虹高挂的一条条皮带机。而且每当入夜,灯山光海的圆辉,凝成丛山中巨大的夜明珠,江流象条闪光的银带,机械修配厂的熔炉化铁的红光象烧山的野火,电焊的蓝弧光象远天闪耀的星星。

只有古柏知道这昔日的野岭荒山、恶水险川,是怎样变成了今天的繁华世界!

当混凝土大坝建成以后,当水轮发电机组放射千里电流的时候,当巨型江轮遨游峡谷的时候,当水库蓄得万顷碧波的时候,这古柏将被用铸花铁栏栅围起来,保护起来,因为这一带将要成为祖国最美丽的大公园之一。千百年代后,让这棵突立在鲜花复盖山头的古老柏树,永远做一个见证人——我们这一辈是怎样给后代子孙创造了绵绵不断的幸福生活的。

这个春天,古柏枝叶忽然变得茂盛起来。愿这棵临江古柏千秋繁茂,万古长青!

茅　屋

茅屋两三栋,座落在老虎沟里。自从建设水库,炮声早已把老虎吓跑。现在,老虎沟已经改名凤凰村。

陈年旧月,这一带原是三不管的地方,山上少人迹,水上少船行。茅屋孤零零地贴伏在沟底,两边是冷冷清清的荒山坡。这里,是贫瘠的黄土深沟,天雨一团糟,天晴一把刀,只能稀稀疏疏地种些包谷。这里,虽然离江不远,但是听见浪声却喝不到水。茅屋主人春来只能挖些“地钱皮”充饥,雨期只能蓄些黄泥水解渴。

行山的人不进老虎沟,船只不在这荒凉的河岸停泊。茅屋主人在这远离尘寰的绝境,年年修补茅屋,岁岁过着寂寞的生活。

这一天,忽然一群小伙子和姑娘给这破烂的茅屋带来了笑声。

小伙子和姑娘晒得黑黑的,又健壮,又欢蹦。他们声声“爷爷”“奶奶”地称呼茅屋主人。他们修篱笆、补茅屋,刷墙、扫地,挑水、烧锅,跟茅屋主人亲热得象一家人。

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用木板架起了桌子,摆上计算尺、图纸、红蓝铅笔和半圆仪,屋角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